

一九四〇年十月，南部的楊士養、北部的陳溪圳、黃六點、徐春生、葉金木、汪宗程等牧師前往東京參加日本基督教會大會，暨日本開國二千六百年的紀念信徒大會。當時的臺灣大會議長楊士養牧師，更代表我臺灣教會應邀參加於十一月十日在東京市宮城前大廣場舉行的「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式典暨奉祝會」。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信徒大會，是在政府的奉祝會前之十月七日舉行的。當時日本政府的集權主義政策盛行，這種紀念大會，可被政府利用做促進全國基督教團體聯合之工具，自爲他們所歡迎，因此，在該紀念大會成立的第二年，即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日本全體新教各教派的代表聚集在東京麹町區富士見町教會，舉行爲期兩天的聯合日本全體基督教組織之「日本基督教團」之創立總會。嗣後我臺灣教會，爲避免日人的歧視，曾派員前往日本交涉參加「日本基督教團」。可是因爲我臺灣教會是殖民地的教會，所以無法直接參加該日人教會的組織。而後我臺灣教會模倣「日本基督教團」，在臺參加日人教會組織，此乃一類似日本基督教團之戰時教會組織。

一九四一年八月末，情勢日益危急，筆者認爲如錯過這次旅行機會，今後勢難再有，於是就利用夏天假期前往北海道作了一星期的旅行。筆者從函館港回航返東京時，像往航時一樣，在津輕海峽的連絡輪船上，仍然是滿船的「學生勤勞奉仕團員」。他們都是利用暑假，前往千島列島造飛機場，正回來讀書的大學生們。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筆者在東京新宿驛所看到的，也仍和往常一樣，滿是出入的水兵。後來始知這些都是日人對外隱瞞偷襲珍珠灣所作的詐術。當時筆者可說也和全體日人一樣，親眼目睹

了他們的領導者發動錯誤戰爭。

## 第八節 台灣教團成立之經過

當太平洋戰爆發時，因爲加入日本基督教團，乃是保衛我教會立場之良策，因此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二十回臺灣大會在臺北神學校舉行時，臺灣大會中之南北合一部會主席楊士養牧師便向大會報告該部會視「臺灣大會」爲南北合一之「實質型」，並建議以臺灣大會名義，迅速加入日本基督教團。因之，第二十回臺灣大會按照該會第二十七條議案，議決立即參加日本基督教團，並委任大委向日本教團當局交涉進行。可是我們的此項表示，無論在日本或臺灣都未被日人教會重視，因此，大戰爆發之初，雖然政府一再要求我們適應他們的集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之新體制國策，但我教會對自己的前途，却無法制定任何決策，僅是束手旁觀，靜待日人教會方面的反應而已。

在此情況下，前由日人教會主倡而組織的「北支事變全臺灣基督教奉仕會」，爲要擴張其組織，於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八月五日在臺北召集我教會全體傳教師參加該會所辦爲期兩天的「全臺灣基督教傳教師練成會」，連同前未曾參加的天主公教會，也包括在該會內。（按當時到會傳教師計日本基督教團二一名，聖公會四名，天主公教會八名，北部長老教會四六名，南部長老教會九四名，基督教青年會一名等共一七四名）。第三天（八月七日）「臺灣基督教奉公會」由日本基督教團臺灣教區、日本聖公會臺灣傳道區、日本天主教臺灣教區、南部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北部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臺灣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婦女矯風會臺灣部會等七團體組成，並於下午七時半在臺北市公會堂舉行成立典禮。當晚參加成立典禮的日臺信徒共有一千三百多名。理事長上與二郎及由各參加單位選出的理事十七名之外，在全島各地區派有地方委員及委員若干名。



同年八月二十八日「臺灣基督教奉公會」由該理事會更改名稱爲「臺灣基督教奉公團」，並議定該團規章。然後上與二郎牧師以奉公團理事長的身份，於同年十月一日前往臺中，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往臺南，翌年一月七日前往高雄，一月十九日及二十一日分別前往臺東及花蓮港等地，分別主持各地的奉公團地方支部成立儀式。此奉公團的支部成立儀式，當時除了花蓮港被教外人士阻止而不能開會舉行外，其他都按照原來計劃盛大舉行。而關於基督教奉公團的目的，在規章第二條曰：「奉戴對美、英兩國之宣戰大詔之聖旨，發揮皇國民之本分，盡基督教報國之責，以資練成皇民爲目的。」又關於該團的事業，在規章第十一條曰：「開辦以提高會員識見爲目的之講習會、講演會、修養會等，昂揚國民之戰時意識，善導國民之戰時生活，協助推行國語（日語）以使內臺一體化，舉行戰捷祈禱會等等。」如斯，基督教奉公團正像當時「皇民奉公會」般，乃是領導我教會做爲戰爭發動者的工具，雖然這些組織不是我們教會的直接治會機構，但卻給了日人驅使我全體教會之試驗，使他們日後更容易與我教會合併成爲他們所理想的「臺灣基督教團」。

就在此時，隨着基督教奉公團的成立，我南北兩大會進行合一之呼聲，又死灰復燃。當時雖然在北間已設有臺灣大會，且我們間的部份人士也視臺灣大會爲南北合一之「實質型」，故對此不再廢掉而只加以改進而已。但這種主張無法使內外滿意。尤其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臺灣大會議長陳溪圳交涉加入日本基督教團事未得結果，從日本回來以後，南北兩大會的再聯合一事，已達到非實行不可的階段。在此稍前，即同年十月，北部大會常置委員會曾提出南北教會合一及神學校共同經營兩案，向當時南部大會議長楊士養要求考慮。尤其第二案的神學校共同經營事，極爲臺北神學校理事長上與二郎所關心，因此，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爲了南北的合一問題，南北兩大會議員在臺北神學校召開臺灣大會臨時會議，並定於同月二十五日舉行「創立總會」。

此一度曾在太平洋戰爭中創設的我「總會」，按照前臨時大會所定，由南北兩教會之議員八十五名於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在彰化基督教長老教會舉行開會典禮。當天的來賓，除日本基督教團臺灣教區長上與二郎外，總督府也派文教局宗教調查官宮本延人與會觀禮。當「創立總會」開會時，前任大會議長陳溪圳致辭說：「今天南北長老教會聯合成立總會，不過是創設臺灣基督教團的第一步而已。今總會成立後，我們要進行的第二步乃是不分內臺之區別，在基督裏面將全體臺灣的抗羅宗基督教合而爲一，以期早實現名符其實的臺灣基督教團。願大家爲此努力」。繼之，宮本宗教調查官也致辭說：「你們今天所進行的乃是第一步，但此合一可以說已經遲了，然而第二步，即『內臺一如』的工作正在等候你們。」如此，這次總會的命運在成立典禮時已被宣告出來，做爲要組成的臺灣教團之前身而已。當天在總會組織時，楊士養、高瑞莊、盧文福、吳永華等分別當選正副議長書記，並將全島教會劃分爲（一）臺北（臺北州及花蓮港廳），（二）中部（臺中州及新竹州），（三）臺南（臺南州），（四）高雄（高雄州、臺東廳及澎湖廳）等四個教區，置事務所於總會議長的所在地臺南市。「創立總會」也決定總務局長盧文福、傳道局長陳溪圳、日曜學校局長郭名烈、教育局長繼山謙三（許有財）、財務局長李明道、財團法人理事長蔡愛仁及鄭蒼國、神學校理事長上與二郎等之任命，同時也議定在三月中成立全島四教區的教區會。

我長老會總會成立後的兩個月，即一九四三年五月上旬，由上與二郎牧師召集的「臺灣基督教團設立委員會」在臺北成立，並正式開始籌備該日人對我教會要求參加的戰時組織。當時在臺的日人教會，除了日本聖公會外，已全部參加了在日本成立的日本基督教團，且該聖公會也已訂於是年十月參加該團，因此，臺灣基督教團之創立，實際上只是日人教會和臺人教會之合併行動而已。又當時在臺的日人教會，除了基督教青年會以外，沒有像我們臺人教會之神學校及醫院等機關，且日人教會雖要



與我們臺人教會合併，但他們仍然可與日本基督教團維持原有關係。因此，我總會負責人向日人教會要求，凡要與我合併，組織另一個「臺灣教團」之日人教會，應與「日本教團」斷絕關係，始能達成所謂「內臺一如」的真正合一。按當時我們對於日人教會之一面與日本基督教團維持關係，而另一面又與我臺灣教會合併之行動，稱之爲「日人教會之雙重籍問題」。又關於臺灣教團的名稱問題，最初設立委員會定爲「臺灣基督教團」，但後來日人要求以「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爲正名，始能表現「臺灣教團」之所謂「日本的性格」以資樹立所謂「日本的基督教」。如此，教團設立委員會一開始便逢正名問題，雙重籍問題，神學校經營等諸難題，雖然該委員會於同年九月初旬特舉「內臺協議委員會」開會研究，又總督府文教當局也出面作了所謂「指導」「斡旋」等工作，但至十一月間尙無法獲得結果。其間（同年十一月中旬）臺灣教團的官方主持人宮本延人被調動爲陸軍司政官前往南方，而後再經其後任宗教調查官石川眞澄催促，至翌年（一九四四年）終告成立，但日人教會仍維持其與日本教團之關係，並於四月二十九日在臺北市幸町教會舉行「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設立開幕式」。當天在成立典禮上所發表的教團領袖陣容：統理者上與二郎、總務局長中森幾之進、傳道局長陳溪圳、財務局長劉子祥、臺北教區長塚原要、臺中教區長山崎米太郎、臺南教區長滋野眞澄（陳金然）、高雄教區長繼山謙三（許有才）、東部教區長徐復增等，並置事務所在臺北市明石町教會（今許昌街臺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址）。

臺灣教團係依照日本基督教團採取監理會的教區及教職制度。這種制度在一年前已由我南北兩長老教會的「創立總會」施行過，但稍與我「總會」不同的，乃是將臺灣東部諸教會另成一個教區，即全島分爲（一）臺北教區（臺北州及新竹州），（二）臺中教區（臺中州），（三）臺南教區（臺南州），（四）高雄教區（高雄州及澎湖廳），（五）東部教區（臺東廳及花蓮港廳）等五教區。在前「總會」未曾設定東部教區時，

臺東廳及花蓮港廳分別歸屬於高雄教區及臺北教區。不但如此，教團事務所也由臺南移轉臺北，因此，這教區的變動使當時的南部教會非常不利，然由北部教會的立場看來，却是相當滿意。又關於臺北神學校的經營，當時「教團規則」沒有明文規定，又部分日人對於此事也抱不平，但當時臺北神學校理事長上與二郎因爲是教團統理者，所以臺北神學校雖然沒有變成教團經營的學校，但仍舊繼續維持下去。不過上與二郎牧師在籌備教團時，曾強迫南部大會交出臺南新樓的土地，而後將此土地更爲「私立臺北神學校維持財團」所有，這事不但使南部大會非常痛心（請參閱楊士養著「南大教會史」八二及八三頁），而且光復後爲了恢復原來的名義，給臺南神學院惹下極大的麻煩。

又關於「東亞傳道會臺灣地方部」（一九三九年五月創設）與臺灣基督教團的關係問題，在此時也被人熱切矚目着。因爲其東京本部已在前年十一月解散，而其事務由日本基督教團東亞局掌管，又當時在該會臺灣地方部服務的莊丁昌、賴炳炯兩位牧師也結束他們的任務回臺。因此，當時只留溫榮春牧師一人在廣東孤軍奮鬥繼續工作。終於，一九四四年五月七日（即在臺灣教團成立的第八天）該臺灣地方部由委員會宣佈解散，但爲支援溫牧師在廣東的工作起見，該地方部委員們即另組「南支傳道後援會」，至日本戰敗溫牧師回臺爲止，而該後援會的會長乃由荒井賢次郎先生擔任。